

主婦偵探—談達里雅·東佐娃的諷刺偵探小說*

江慧婉**

摘要

二十世紀末，由於政治體制更迭，俄羅斯文學產生急遽變化：隨著檢查制度廢止及經濟市場化，文學成為商品，為了滿足讀者的不同需求，科幻、犯罪冒險及言情等大眾文學順勢崛起，尤其偵探小說發展迅速，到了 1990 年代中期女性偵探小說躍升為最受歡迎的讀物，其中東佐娃以「歐巴桑」為主角創作的諷刺偵探小說異軍突起，銷售量領先群雄。儘管不少文學評論家對她的作品嗤之以鼻，東佐娃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及嘲弄戲謔的筆調刻畫出當代俄羅斯的浮世繪，並佐以家庭主婦熟悉的日常生活細節，引起女性讀者共鳴。此外，無論情節如何峰迴路轉，故事最後總以「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結尾，強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正面樂觀的生活態度，瀟灑令人振奮的遠景，具有撫慰、激勵人心的作用。東佐娃作品的暢銷反映出近年來俄羅斯社會的部分潛在心理：亟欲擺脫晦澀蕭條的過去邁向繁榮進步的光明未來。

關鍵詞：大眾文學、女性偵探小說、諷刺偵探小說。

* 本文 2013 年 9 月 11 日到稿，2013 年 12 月 15 日審查通過。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講師。

On Daria Dontsova's Ironic Detective Fiction*

Hui-Wan Chiang**

Abstract

In the 1990s the book market in Russia radically changed. Due to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iterature, “serious literature” was substituted by various historic and romantic novels, fantasy, thrillers and detective fiction, which since the early 1990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genres in post-Soviet Russia. And женские детективы (female detective stories) started to appear and have been the most popular from the mid-1990s. Dontsova's detective stories, whose female protagonists overcome a number of obstacles, undergo a moral, physical, or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ry to restore order within her own world, provide the readers optimistic pathos, simple values, fairy-tale idealism and upbeat didacticism. The popularity of Dontsova's ironic detective fiction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recent transition in Russian popular values: from nostalgia, criticism and pessimism to forward looking optimism, hope and faith in the post-Soviet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Key words: popular literature, female detective fiction, ironic detective fiction

* Received: September 11, 2013; Accepted: December 15, 2013.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大眾文學興起

長期以來，俄羅斯大眾文學（масс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¹並未受文學評論家重視，有些評論家甚至對大眾文學作品嗤之以鼻。此外，大眾文學也遭到一些讀者（多半為高級知識份子）抵制，他們認為大眾文學層次低，讀偵探、科幻、冒險或言情小說會降低自己的文學品味及審美觀，因而拒絕閱讀大眾文學作品。但隨著出版檢查制度廢止及蘇聯解體，大眾文學像潰堤的洪水般湧入俄羅斯，出版市場充斥各類大眾文學，有些作品不但改編成電視影集或電影，甚至譯成各國語文行銷海外，為出版商和書商賺取豐厚的利潤。

俄羅斯學者卡佐勒格（Оксана Козорог）引用俄國文學理論家洛特曼（Юрий М. Лотман, 1922-1993）對大眾文學的看法解釋俄羅斯 1990 年代的大眾文學現象：數量上而言，大眾文學作品普及大眾，足以反映真正文化現象，但這類作品的評價極低，甚至被認為是劣等、粗鄙、過時而受到排斥（Козорог 2003: 113）。檢查制度廢止後，作家得以擺脫官方意識型態的控制自由創作，而厭倦說教式的社會主義寫實文學的讀者也想換換口味，雨後春筍般成立的出版社考慮到市場需求，開始大量發行偵探、驚悚、科幻、奇幻、言情、歷史等各類型的小說。也就是說，解體之後市場經濟對出版業有顯著的影響－文學作品史無前例地搖身一變成為商品：蘇聯時期文學秉持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原則，肩負「文以載道」的使命，宣揚社會主義社會的正面價值觀；文學商品化之後，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書籍的價格挑選書刊，而作家在題裁、主題的選擇及寫作風格的運用不得不兼顧消費者的期望與要求，以便刺激銷售量。

俄國社會學家何瑞諾夫（Николай А. Хренов, 1942-）指出，當人們對當權者失去信賴，對社會菁英失望，便將大眾文化當作忘卻現實生活的避風港，幻想所有個人煩惱都能順利解決（Хренов 1998: 261-262）。1990 年代初，俄羅斯普羅大眾在傳統道德價值淪喪之際，面對急遽變化的生活不知所措，每天為求溫飽而汲汲營營的人們閒暇之餘只想放鬆心情，瀏覽消

¹ 有關大眾文學的定義不一，有人稱之為「流行文學（популя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庸俗文學（тривиа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副文學（паралитература）」，甚至有人稱之為「粗俗文學（упрощ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遣文學是他們的最佳選擇。俄羅斯社會文化學者葉拉索夫（Борис С. Ерасов, 1932-2001）認為，大眾文化是人們宣洩現實生活中的龐大壓力、抒解疲憊與漠然、殘酷與侵犯、絕望不確定感、羞辱與恐懼等負面情緒的途徑²。一項大眾文學讀者調查顯示，言情、偵探小說的讀者個性較為焦慮、沮喪及悲觀。他們收入不高，且對政治現況不滿，藉著閱讀大眾文學逃避現實，暫時抒解現實生活的壓力（Levina 2003: 82）。

俄羅斯大眾文學發展至今不過一、二十年，已躍升為書籍市場的熱門商品。暢銷的大眾文學作品儘管文學性不高，卻生動地呈現當代的社會文化。優質的大眾文學不多，暢銷作品隨著讀者的興趣不斷更迭，大眾文學的主流也跟著消費者的要求快速改變。大眾文學的快速發展對偵探小說類型有很大影響，偵探小說開始融入心理、神秘、冒險和浪漫情愛等元素，諷刺、警世及幽默的犯罪分析更成為偵探小說的特色。古典偵探小說中，從種種蛛絲馬跡抽絲剝繭，在眾多嫌犯中尋找真兇的精彩部分在現代作品裡已越來越罕見，學者卡佐勒格便直言，當代俄羅斯偵探小說的特點之一是缺乏推理過程（Козорог 2003: 114）。

二、偵探小說的發展

儘管許多文學評論家認為偵探小說並非文學，甚至批評其品味低俗，然而當代俄羅斯偵探小說讀者眾多卻是不爭的事實。後蘇聯時期由於貧窮問題日益嚴重、政治經濟不穩定、人口負成長及俄羅斯喪失超強國地位，再加上政府取消出版檢查，造成西方文化產物（墨西哥肥皂劇、歐美流行音樂、消遣小說等）大量湧入俄羅斯，其中最顯著的是偵探小說。美國學者貝爾（Brian J. Baer）認為，造成此一現象的部分原因在於，後蘇聯時期政治、經濟和社會紊亂，通常以尋獲並逮捕真兇收場的偵探小說反映人們對犯罪率不斷攀升的恐懼與期盼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的心理。此外，偵探小說暢銷也顯示蘇聯解體後，市場經濟興起的這段過渡時期，面對西方文化入侵，引發俄國人對喪失自我認同，與傳統價值觀改變的不安（Baer 2005: 243）。

² 轉引自：Komarova, Olga. "Crime Does Pay: The Popularity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Detective Stories", 2003: 1. Available: <http://munin.uit.no/bitstream/handle/10037/640/article.pdf?sequence=1> (2013/08/30)

雖然二十世紀末俄羅斯偵探小說才蓬勃發展，然而十九世紀便曾有阿赫沙儒莫夫（Николай Д. Ахшарумов, 1820-1893）和采哈諾維奇（Александр Н. Цеханович, 1862-1897）等作家發表犯罪小說（уголовные романы），不過他們的作品早已被人們遺忘。一般認為，偵探小說是源自西方的「舶來品」，曾於二十世紀初兩度造成風潮：1905 至 1908 年間由於檢查制度廢止，一系列改編自歐美《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尼克·卡特》（Nick Carter）與《納特·平克頓》（Nat Pinkerton）等作品的冒險偵探小說風行一時；1920 年代初期，因為內戰和新經濟政策時期生活節奏急遽變化，包括偵探小說在內的各種冒險小說再度引起人們的興趣。「謝拉皮翁兄弟」（Сер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成員倫茨（Лев Н. Луцц, 1901-1924）呼籲當時作家仿效柯南·道爾（Conan Doyle, 1859-1930）的故事情節創作通俗小說。1923 年蘇聯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 Бухарин, 1888-1938）認為，西方消遣文學分散工人對革命運動的注意力，主張將意識型態融入偵探小說，提出「紅色平克頓」³運動。作家莎吉娘（Мариэга Шагинян, 1888-1982）率先響應，以筆名吉姆·達樂（Джим Доллар）發表系列小說《梅斯-曼德》（Месс-Менд），不但造成轟動，且於 1926 年翻拍成電影。史達林時期，因倡導社會主義寫實文學，偵探小說逐漸絕跡。史達林去世後數十年間，偵探小說在蘇聯死灰復燃，但此時偵探小說有濃厚的說教意味且缺乏懸疑性，內容大多描述正直的民兵打擊威脅國家安全的惡勢力，故事中女性人物只是無足輕重的配角，沒有破案能力，也不足以扮演罪犯。代表作家有瓦涅爾兄弟（Вайнер Аркадий и Вайнер Григорий）、亞當莫夫（Аркадий Г. Адамов, 1920-1991）、西蒙諾夫（Юлиан С. Семёнов, 1931-1993）等，他們都師法西方作家創作系列小說。其中以西蒙諾夫筆下的雙面間諜馬克辛·伊薩耶夫（Максим Исаев）最受歡迎，1973 年根據西蒙諾夫小說《春天的十七個瞬間》（Семнадцать мгновений весны）拍攝的同名電視影集也締造收視佳績。總之，史達林時期以外，俄國人民會大量閱讀偵探小說，且樂此不疲（Непомняшчы 1999: 165）。

戈巴契夫重建時期（Перестройка）以前，純文學書籍出版量嚴重受限，1986 年以後

³ 「紅色平克頓」指的是當時蘇聯作家模仿革命前盛行的《平克頓》，描寫追逐、喬裝、秘密藏身地點等情節的冒險偵探小說，情節多為工人階級對抗資本家；詳見：Russeli, Robert. "Red Pinkertonism: An Aspect of Soviet Literature of the 1920s" *SEER*, vol. 60, 3(1982): 390-412.

年民營出版社相繼成立。曾經受批判、壓制及流亡作家的作品一一解禁，出版社順應潮流，大量出版廣受喜愛的經典名著，如：普希金、萊蒙托夫、阿赫瑪托娃、巴斯特納克、納博可夫及索忍尼辛等人的作品。直至 1991 年，讀者對純文學的興趣降低，出版社開始發行西方大眾文學的翻譯作品，歐美驚悚小說、犯罪小說充斥俄羅斯書市，以色彩鮮豔的封面和扣人心弦的情節吸引讀者，登上暢銷排行榜。不久之後，俄國作家仿效西方大眾文學作品，以本土化風格寫出偵探、驚悚、歷史、言情、奇幻等類型的通俗文學，逐漸受到讀者廣泛喜愛。(Boden 2009: 52)

1990 年代初期，偵探小說成為後蘇聯時期最受歡迎的大眾文學，小說的形式與內容都和蘇聯瓦解前大異其趣。當代偵探小說從充滿腥、羶、色、打鬥的冷硬派偵探小說(боевик)到阿庫寧(Борис Акунин, 1956-)的歷史懸疑小說，可謂無所不包。冷硬派偵探小說最受歡迎(尤其是男性讀者)，這類小說的故事情節以血腥犯罪為主，暴力打鬥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主角多為阿富汗戰爭或特種部隊退役軍人，個性孤僻、剛毅，有強烈愛國精神及正義感，可以赤手空拳擊敗壞人，猶如打不倒的超人，堪稱俄羅斯版「藍波」，與蘇聯時期的作品一樣，女性只是陪襯角色，藉以彰顯主人公的男子氣概。著名的冷硬派偵探小說作家是朵岑科(Виктор Н. Доценко, 1946-)、卡芮茨基(Данил А. Корецкий, 1948-)。

三、女性偵探小說崛起

到了 1990 年代中期，女性偵探小說(женские детективы)成為很受歡迎的讀物。根據一項研究顯示，女性讀者廣泛閱讀是大眾文學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據調查，25 至 49 歲的俄羅斯女性 82%有閱讀習慣，這群讀者最喜歡的作品分別是女性偵探小說、女性散文作品(женская проза)和言情小說⁴。與冷硬派偵探小說不同的是，女性偵探小說強調人際關係，避免血腥暴力描述，穿插許多與案件無關的情節，如主角的日常生活細節以及個人境遇等

⁴ “женская проза”泛指從「高雅文學」到「黃色書刊」等所有女性作家的作品。轉引自：Shelton, Joanne. “The Russian Woman’s Guide to Surviving the Post-Soviet Era: From Detective Fiction to *glamurnoe chtenie*”, *eSharp*, Special Issue: Reaction and Reinvention: Changing Tim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008: 70.

等，故事背景多半設定在讀者熟悉的後蘇聯混亂社會，經常融入冒險與愛情元素，所以深受女性讀者喜愛。俄羅斯社會學家列維娜（Mariia Z. Levina, 1914-2001）指出，冷硬派偵探小說中的男性超級英雄打擊犯罪、恢復秩序，舒緩讀者內心深處的強烈恐懼；女性偵探小說中的主角雖與一般人同樣有肢體或精神弱點，卻能出其不意擊敗罪犯，象徵平凡女性也有能力為自己掙得「一席之地」（Levina 2003: 91-92）。消遣之餘，透過小說理解現實生活的各種現象，尋找因應新生活的教戰手冊，是這類作品吸引女性讀者的原因。女性讀者以書中女性角色處理後蘇聯時期生活壓力的方式，作為面對嚴峻生活條件的參考（Shelton 2008: 75）。

當代俄羅斯偵探小說作者大多是女性，其中瑪莉尼娜（Александра Маринина, 1957-）、波莉亞可娃（Татьяна Полякова, 1959-）、東佐娃（Дарья Донцова, 1952-）、烏斯季諾娃（Татьяна Устинова, 1968-）等都是廣受歡迎的暢銷作家。俄羅斯學者柯芮涅娃（Maria Koreneva）將這些女性偵探小說主角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國安系統雇員，以瑪莉尼娜筆下的卡緬斯卡婭（Каменская）為代表，瑪莉尼娜的作品主要探討導致犯罪的特殊社會問題；第二類是私家女偵探，如以謝洛娃（Марина Серова）為名的作家團隊書中的伊凡諾娃（Иванова）、阿后特妮可娃（Охотникова）等；第三類是司法調查的門外漢，是僅憑個人興趣和滿腔熱情協助案件受害者的業餘女偵探（Koreneva 2005: 87-92），首位以業餘偵探為主角的作家為東佐娃，事實上，東佐娃的偵探小說堪稱最成功的商業出版品。

四、諷刺偵探小說家東佐娃

東佐娃原名阿格里平娜·瓦西里耶娃（Агриппина А. Васильева 1952-），出生於莫斯科，父親是知名作家阿爾卡季·瓦西里（Аркадий Васильев）。1974年東佐娃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長期在報社和雜誌社擔任記者，也曾教授法語與德語。七〇年代末便完成第一部中篇偵探小說，但因缺乏「市場性」遭《青少年》雜誌退稿而放棄文學夢。1998年因大病接受手術治療，住院期間再度拾筆嘗試偵探小說創作，1999年「愛克斯摩」（Эксмо）出版社發行她的第一部小說《狠毒的繼承人》（Крутые наследники），大受歡迎，從此她專職寫作，成為多產作家。「愛克斯摩」同時取得她六部書的出版權，2000年先後發行，在書腰

上標示「諷刺偵探小說」(иронический детектив)⁵，並強調是女性偵探小說，此一行銷策略奏效。東佐娃持續創作第二和第三系列小說，至今她已有六個系列共百餘本暢銷作品，每系列各有不同偵探主角，波杜舒金(Иван Подушкин)以外，其餘主角皆為女性。儘管有文學評論家對東佐娃的作品不屑一顧，但她多次獲選為年度作家，作品登上暢銷排行，甚至被改編搬上電視螢幕⁶。

本文主要探討以已婚(或離婚)業餘女偵探為主角的前三系列作品：

系列一主角達莎·瓦西里耶娃(Даша Васильева)原是大學法語教師，在閨中密友娜塔莎(Наташа)意外繼承大筆遺產後，辭去教職，搬去和好友同住，從此晉升為無憂無慮的貴婦。達莎有過四次婚姻，「每次都以同樣結局收場：我收拾包袱離去。的確，每段婚姻都有賺頭。第一段婚姻我得到阿卡奇(Аркадий)，他是我首任丈夫的兒子，但在我和他父親離婚後，他就跟了我；第二次出嫁，我得到一隻不知是什麼品種的小狗；第三次結婚造成我對雅詩蘭黛「雅男士」古龍水過敏；第四次得到的禮物是瑪莎(Маша)。當時十四歲的阿卡奇大發雷霆：『如果你想收養所有的棄兒，收養個小男孩也罷，而不是這個流鼻涕的小女孩！』」(За всеми зайцами, 2000: 47)此外，達莎還養了幾隻寵物。

與達莎境遇相反，系列二主角葉芙蘭琵婭·羅曼諾娃(Евлампия Романова)原為嬌縱的貴婦，發現身為俄羅斯新貴的丈夫外遇，憤而離婚。後來被路上的好心陌生人卡琪雅(Катя)收容，與卡琪雅的家人同擠在一間小公寓裡，從此過著一般人的勤儉生活。卡琪雅是個單親媽媽，有過四次失敗婚姻，收養兩位前夫所生的兒子，也養貓、狗、倉鼠等寵物。系列故事發展過程中，一文不名的葉芙蘭琵婭捨棄富裕生活，擺脫原有的膚淺虛偽，在不受金錢和消費主義污染的世界中找到幸福，從此展開全新的人生，後來與經營偵探事務所的馬克斯(Макс)再婚。

系列三主角維奧拉·塔拉坎諾娃(Виола Тараканова)任職《犯罪故事》雜誌女記者，

⁵ 「諷刺偵探小說」乃指具幽默諷刺意味的偵探小說，波蘭作家赫梅列夫斯卡婭(И. Хмелевская)可說是「諷刺偵探小說」的始祖。莫斯科的幻影出版社(Фантом-пресс)發行赫梅列夫斯卡婭作品的俄文譯本時，以「諷刺偵探小說」作為宣傳，從此該名詞陸續為人沿用，東佐娃為俄羅斯第一位諷刺偵探小說作家。

⁶ 東佐娃曾於 2001 至 2003 年及 2006 至 2010 年連續獲選為年度作家，筆下的達莎·瓦西里耶娃及葉芙蘭琵婭·羅曼諾娃系列小說曾改編為電視影集，作品發行量至今仍居排行之冠。

已婚，和好朋友塔瑪拉（Тамара）住在兩房公寓裡。維奧拉的先生奧列格·庫普林（Олег Куприн）是刑事局少校。維奧拉從小遭年輕的母親遺棄，後來酗酒的父親又因故入獄，由常口出穢言、嗜酒如命的繼母賴莎（Райса）扶養長大，從小過著困苦的生活，也未受過高等教育。

1. 鄰家大嬸

與東佐娃的大多數讀者一樣，達莎、葉芙蘭琵婭及維奧拉都是長相普通、不受男人青睞的寂寞家庭主婦（即使已婚的維奧拉也常抱怨先生對她不理不睬），生活平凡乏味。三人在性格上有若干共同之處：不切實際、像孩童般天真容易相信別人，大而化之、迷糊，有些笨拙、莽撞，所以常陷入荒謬的狀況；古道熱腸，喜歡幫助親友、鄰居，也常出其不意地得到旁人協助；出於強烈好奇心和正義感，熱心協助遭逢不幸的人，逕自進行調查，卻缺乏分析能力、沒有邏輯，調查案件全憑女性直覺，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捲入事件。三人面對艱困的生活環境各有因應之道，展現她們的應變能力：達莎即使在異國也能妥善解決各種問題；捨棄養尊處優的貴婦生活後，葉芙蘭琵婭不但立刻融入收容她的大家庭，也很快適應中產階級的簡樸起居；維奧拉雖然稱不上「巧婦」，對於家中大小瑣事也總能迎刃而解。

關於過去，三人都有「難唸的經」，各有層出不窮的家庭問題：達莎在蘇聯時期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每月 15 和 30 日發薪，但 13 和 28 日我們就開始搜遍所有口袋、抖晃皮包，希望能意外地找出幾毛錢。為了多攢一點錢，什麼都做過：曾在銀行開戶，每月存入十五盧布；買過撲滿、將硬幣塞入空的香檳酒瓶...全都無濟於事。但錢要從哪兒來？我在一所三流的理工學院教法語...」（Бассейн с крокодилами, 2001: 2）；葉芙蘭琵婭是父母年近半百才生下的獨生女，老來得女的母親對她過度保護，剝奪了她的快樂童年。「當其他小朋友滿臉通紅地玩著雪橇，我只能穿著毛皮大衣、兩雙靴，戴上手套和圍巾，一動也不動地在一旁嫉妒地看著他們。為了我好，媽媽不讓我像其他孩子一樣玩耍。」（Маникюр для покойника, 2007: 1）；維奧拉的親生母親在她「還未滿一個月大的時候就離去」，父親則是個「有資歷的酒鬼和累犯」（Урожай ядовитых ягодок, 2002: 11, 12），所以她無法上大學，即使「我德語學得非

常好，畢業證書上全是優等，但當我和塔瑪拉剛剛考進高等專科學校時，我們身邊連一個親人也沒有，只得去找工作謀生。我靠拿水桶和抹布清掃垃圾，度過很多年」(Урожай ядовитых ягодок, 2002: 22)。此外，她們都不是賢慧的家庭主婦，不善縫紉、打掃，也沒有精湛的廚藝，但她們都很勤奮工作，認真踏實。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家庭方面，她們都與沒有血緣關係的家人同住，共組非婚姻關係的大家庭：除了娜塔莎，與達莎同住的還有達莎（非婚生）的兒孫和不時從莫斯科來造訪的客人—「我們和娜塔莎住在巴黎近郊的一座富麗堂皇的豪宅。我的兒子阿卡奇學法律，他的妻子奧麗婭（Оля）學藝術，而十四歲的女兒瑪莎就讀於中學。同住的還有兩隻狗，牠們總是無憂無慮地在屋子裡及花園跑來跑去...只有一件麻煩事擾亂了我們富足快樂的生活—絡繹不絕來自莫斯科的訪客。」(За всеми зайцами, 2000: 1)；離婚後一文不名的葉芙蘭琵婭流落街頭，被路上遇到的陌生人收留，從此和這一家人同住在一間小公寓裡；維奧拉則和先生奧列格與塔瑪拉一家人—包括塔瑪拉、夫婿謝苗（Семён）、他們的小男嬰尼基塔（Никита）及謝苗與前妻生的女兒克里斯蒂娜（Кристина）一同生活。雖然三人皆無生育，卻對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視如己出，呵護備至。她們也都收養流浪動物，充分展現仁慈與愛心。此外，無論是成為貴婦的達莎、簡樸的葉芙蘭琵婭或是家境小康的維奧拉都做開大門收留落難的陌生人，例如在《來自煙壺的惡魔》(Чёрт из табакерки, 2002)中，維奧拉深夜遇見一位在街上徘徊的年輕失憶女子，擔心她流落街頭便帶回家照顧。

在社會主義寫實文學的童話中，快樂的大家庭往往是故事人物脫胎換骨、成功蛻變的最大助力⁷。承襲相同的脈絡，搬到巴黎與娜塔莎同住的達莎，協助摯友擊敗殺害公爵（娜塔莎的丈夫）的兇手（Крутые наследники, 2007）；葉芙蘭琵婭加入素昧平生的卡琪雅家庭後才尋回真正的快樂；而自小失怙的維奧拉更是一路與密友塔瑪拉相互扶持、努力奮鬥，才有

⁷ 關於社會主義寫實文學童話的探討，參見：Balina, Marina. "Introduction", In Marina Balina, Helena Gosילו, and Mark Lipovetsky, ed. *Politicizing Magic: An Anthology of Russian and Soviet Fairy-Tale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P, 2005: 105-119.

今日的安康生活。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系列小說的女主角為同一人，無法總是以吸引女性讀者的愛情橋段作為故事主軸，所以不斷增添家庭成員也可能是東佐娃發展後續作品情節的一種手法（Кронгауз 2005: 143）。

東佐娃在自傳中坦承自己的作品「一方面是偵探小說，另一方面是家庭故事」，故事裡充滿「嘻嘻哈哈、貓、狗、傻裡傻氣的女主角和成堆的屍體，卻一點也不可怕」（Записки безумной оптимистки, 2005: 69）。三系列小說中有兩個並行的主軸：一是女主角根據發現的線索進行調查、質問嫌犯，最後運用智慧推敲整起案件的來龍去脈；另一個是圍繞在女主角及其親友的家庭日常生活細節造成的喜劇效果。故事以家庭衝突開始，最後總是皆大歡喜的結局。家族的喧鬧紛爭沖淡犯罪案件的駭人色彩，對東佐娃的女偵探來說，家庭和諧才是核心價值，案件破解還不如家庭幸福美滿重要。

3. 善有善報，「有為者亦若是」的積極意義

東佐娃以幽默諷刺的方式描述日常生活的千變萬化及瑣碎家務，展現女主角的仁慈與強韌自主，作品具鼓舞、療癒功能，激發讀者樂觀向上。三系列都從女主角遭逢巨變（如離婚、失婚或貧困潦倒）開始，敘述她們蛻變後的遭遇，最後壞人都遭逮捕或受懲罰，強調「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正面樂觀的生活態度：無論環境如何變化，只要堅持既有的價值觀，人們必能克服困難、迎接挑戰，很快適應新生活（Mesropova 2006: 275）。

作者不諱言其作品之所以暢銷在於故事中的「童話」本質，「我書中傳達的想法很簡單——一切都沒問題，沒有人會死亡，一切都很好」⁸。三位女偵探有相似的際遇，她們克服重重困難，歷經精神、物質或財務上的轉變，最後因為行善而有更美好的人生：達莎遭逢財務及個人種種危機後，意外繼承法國人的豪宅；葉芙蘭琵婭原本過著新俄羅斯人的富裕生活，結束不快樂的婚姻後失去所有財富，在人助自助下蛻變為安貧樂道的中產階級，後來更覺得幸福歸宿；維奧拉與生命中的真命天子結婚後，改善左支右絀的拮据生活。她們有穩定的性

⁸ 轉引自：Mesropova, Olga. "Crime, Byt, and Fairy Tales: Daria Dontsova and Post-Soviet Ironical Detective Fiction", *SEIJ*, vol. 52, 1(2008): 116.

格，安貧樂道、善良、正義、熱心助人，順利通過俄羅斯經濟轉型時期種種考驗，可謂後蘇聯的正面典範。至於書中那些無法擺脫貧困的歹徒，通常是好吃懶做、遊手好閒、貪婪、或酗酒、不負責任。例如同樣年幼便遭父母遺棄，葉芙蘭琵婭再婚的對象馬克斯不受悲慘童年影響，奮發圖強，長大後成爲偵探事務所老闆；而《沒有塔樓的女王》（*Королева без башни*, 2010）中的安東（Антон）卻爲了錢淪爲殺人幫兇。誠如作者所說：「每個人生命中都有走運的時候，沒有例外，只是並非每個人都知道如何善用這份好運」。（*Филе из золотого петушка*, 2002: 121）

善有善報，仁慈有愛心的女主角得到幸福快樂後不忘回饋給需要幫助的人，展現紊亂社會中的光明面。在《卡羅爸爸的鍾愛消遣》（*Любимые забавы папы Карло*, 2005）尾聲中，維奧拉在路上遇到一個啜泣的小女孩，她因爲不慎遺失繼母給她買麥片的錢，擔心被打罵而不知所措。維奧拉想起小時候曾有過相同遭遇，當時一位善心婦人拿出一盧布爲她解圍，於是她從皮包掏出一千盧布給小女孩，小女孩起初不願接受，維奧拉安慰她，將來與有錢的王子結婚後，可以幫助其他相同處境的孩子，小女孩才安心收下。最後維奧拉得出結論：「如果每個人都記得曾經接受別人無私的幫助，並以幫助其他人作爲回報，那麼人類就能變得幸福。」（*Донцова*, 2005: 117）。

4. 否極泰來的遠景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以犯罪偵探爲題材，東佐娃的作品不強調現實生活中殺人、搶劫等治安問題，也缺乏傳統偵探小說的推理過程，內容充滿親友間的人際往來和日常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等問題。俄羅斯學者谷尙斯卡婭（Елена М. Гушанская）認爲，除了引人的情節，系列（主角爲同一人）發行之外，爲讀者闡述說明現實，且與讀者潛意識的期待產生共鳴，是當代暢銷偵探小說的重要因素（*Гушанская* 2004: 238）。輕鬆看待犯罪事件和罪犯，好比日常生活中主婦不得不面對的惱人瑣事，如水管破裂漏水、流行性感冒、子女成績不理想、意外懷孕等生活細節，引起女性讀者共鳴，進而對書中人物產生認同，正是東佐娃的諷刺偵探小說暢銷的原因之一。美國文學評論家卡維堤（*John G. Cawelti*, 1929-）認爲，

公式小說 (Formula fiction) 的故事結構陳腔濫調卻仍然吸引讀者，因為它們滿足讀者享受樂趣及逃避現實的需求。閱讀小說時會產生移情作用，想像自己和主角一樣，能夠面對困難，順利解決問題，或幸運地有人幫忙解危 (Cawelti 1976: 38)。無論是犯罪驚悚、愛情小說或是通俗劇都有某種程度的逃避現實功能，在作品的想像世界中，讀者可以暫時將他們的挫折與負面經驗拋在腦後。美國學者梅斯羅波娃 (Olga Mesropova, 1974-) 更進一步指出，東佐娃的諷刺偵探小說以後蘇聯時期經濟、社會文化的快速變遷為背景，淡化處理犯罪事件，結合荒謬的喜劇情境、笑話，巧妙地將犯罪案件幻化為「嘉年華式的有趣冒險」(Mesropova 2008: 115-116)，形塑一個沉冤得以昭雪、正義得以伸張的小說世界，回應讀者潛在的期待心理。

以當代俄羅斯社會剪影為藍圖，東佐娃巧妙融入異國冒險、非比尋常的遭遇、日常家務及許多鮮明的典型人物，生動刻畫現代生活的浮世繪；對犯罪事件則輕描淡寫，強調案件破解之後一切恢復正常，猶如童話故事總是以「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作為結尾。小說中經常結合兩種貌似相互矛盾的景象：一方面描述開放政策時期 (Гласность) 及後蘇聯初期日常生活的艱辛黑暗面，如貧窮的退休人士、薪資少得可憐的教師或街頭的乞丐、不時發生的謀殺和綁架案等；另一方面以普丁時期為背景，呈現享受當下、自我實現和炫耀式的消費主義。過去的晦暗貧苦和今日的和樂安康形成對比，暗示俄羅斯逐漸走出蕭條的困境，邁向繁榮興盛的光明未來。為了平衡兩者的反差，東佐娃以寫實敘事方式融入童話故事的元素，使故事瀟灑教導主義及令人振奮的遠景 (Mesropova 2008: 113-114)。

5. 成事不足的主婦偵探

儘管東佐娃以嘲諷戲謔筆調描繪當今俄羅斯社會中各種光怪陸離現象，但並未跳脫傳統的父權思維，縱使小說中沒有個性鮮明，令人印象深刻的男性角色，但女主角身邊都不乏在檢警相關單位服務的男性友人或配偶：達莎在巴黎有警察局長喬治 (Жорж)，在莫斯科有亞歷山大上校 (Александр) 等友人；葉芙蘭琵婭最初有鄰居少校警官柯斯汀 (Костин)，後續作品中有同為偵探的丈夫馬克斯；維奧拉則有任職於刑事偵查局的先生奧列格。他們總會在女偵探身陷危機時出手相救，故事明明以女性業餘偵探為主角，但推理分析犯罪案件、釐清

真相的卻是這些男性親友。東佐娃的女偵探善良、仁慈、獨立自主卻有勇無謀，空有行動力，經常弄巧成拙，如同奧列格所形容，她們「像是緊追狐狸不放的小獵狐犬...，狡猾的狐狸會在洞穴裡挖出許多通道，並在某一條通道上作記號；當勤勉卻有點傻的小獵狐犬鑽進地下的洞穴時，牠先是迷失方向不知該往哪兒跑，幾秒鐘後想到該善用嗅覺，一旦聞出獵物的氣味便不顧一切地朝著濃烈「香味」飄來的方向奔去。過了一段時間，呆頭呆腦的小獵狐犬鼻子撞上洞穴後面的牆壁。明白狐狸不在這裡後，小獵狐犬立刻往回跑，但狡猾的狐狸早已不見蹤影」(Урожай ядовитых ягодок, 2002: 101)。相形之下，這些具備專業能力的男性檢調人員就顯得冷靜、客觀，在（讀者）不知不覺中揪出元兇。

學者梅斯羅波娃以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人物為例指出，東佐娃的女偵探乍看之下是精明幹練的福爾摩斯，隨著故事情節發展卻發現，她們其實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華生博士 (Dr. Watson) (Mesropova 2006: 280)。天真單純、莽撞衝動的女主角不是搞錯偵查方向白忙一場，對釐清案情毫無幫助，就是弄巧反拙，成為誘引嫌犯現身的餌，最後陷於險境，得靠男性親友相救。也就是說，真正扮演福爾摩斯角色的是冷眼旁觀的男性司法人員。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作者對國家司法體系的樂觀態度，顯示對政府的信心：以男性為主的司法機關會善盡職責維護社會治安，讓百姓安居樂業。同時這也反映出另一個社會現象：儘管蘇聯解體以來生活變得更加多元自由，兩性的權力結構並無明顯改變，在決策過程中，女性觀點仍無法充分表達 (Morgan 2005: 112)。

五、結語

大眾文學缺乏美學價值，既無法通過時間的考驗成為值得再三玩味的雋永經典，也會隨著消費者的興趣更迭而被取代，卻有其社會文化意義——它像一面鏡子照映出社會現況及社會期待。俄羅斯社會學家列維娜認為，蘇聯解體後大眾文學由父權逐漸發展為個人主義相對地反映出社會演變的真實過程 (Levina 2003: 93)。1990 年代中期（即瑪莉尼娜作品開始盛行之時）社會變動混亂之際，出現一群偵探小說的中年女性讀者，她們在蘇聯時期原為中產階級，受過中高等教育，希望在書中看到符合既有道德價值觀及人生經驗的故事情節，而非血

腥暴力場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闡述政府伸張公權力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人物刻畫淺顯易懂，是她們喜愛女性偵探小說的主要原因（Гушанская 2004: 238）。東佐娃的諷刺偵探小說正好出現在女性偵探小說發展的高峰期，不同於閱讀傳統偵探小說時，就書中線索反覆推敲，暗自與偵探主角較勁推理能力的樂趣，東佐娃的主婦偵探不但缺乏抽絲剝繭的智慧，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令人不禁同情，甚至產生自己比業餘女偵探更聰明睿智的優越感（Ишук-Фадеева 2010: 126）。東佐娃的諷刺偵探小說之所以吸引讀者並非犯罪調查過程或案件本身，而是以調查之名窺探他人的樂趣，好比在女性的聚會中談論他人家務八卦，具有心理治療效果。因為在說人是非、道人長短的瞬間會忘卻自身的煩惱，感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自我滿足（Гушанская 2004:242）。小說除了詳述書中人物的生活細節，反映現實社會，也描寫普羅大眾夢寐以求的豪宅、昂貴進口名車、名牌精品、奢華的夜店裝潢及大都會商店中琳琅滿目的商品等等，滿足讀者對否極泰來和愜意生活的幻想。

此外，業餘女偵探個人生活的改善彷彿告訴讀者負面的蘇聯已成過去，今日俄羅斯處處洋溢希望與光明未來。從東佐娃作品的暢銷不難看出俄羅斯社會的部分潛藏心理：亟欲擺脫蕭條貧困的過去和對未來社會經濟環境的樂觀期盼。東佐娃的諷刺偵探小說像是一面鏡子，反映真實的現代社會，另一方面也呈現一個遠離犯罪、貧窮及蘇聯過去的虛擬世界。將當今俄羅斯描繪成一個天理昭彰、罪犯無所遁形、繁榮進步的國度，提高讀者對國家體制的信心與對未來的展望，讓人相信富強安樂的時代即將來臨，獲得繼續奮鬥的力量，或許這就是東佐娃作品發行量長期居冠的一大原因。

參考書目

一、俄文資料

- Гушанская Е. Четыре дамы из колоды детектива // *Нева*. 2004. №10.
- Ищук-Фадеева, Н. Женский детектив как зеркало русск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и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10. №5.
- Козорог, О. Золотой век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учёба*, 2003. №4.
- Кронгауз, М. Несчастный случай для одинокой домохозяйки // *Новый мир*, 2005, №1.
- Хренов, Н.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искусства: теория,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ва, 1998.

二、英文資料

- Cawelti, John. *Adventure, Mystery, and Romance: Formula Stories as Art and Popular Culture*.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76.
- Koreneva, Maria. "Russian Detective Fiction", In Stephen Lovell and Birgit Menzel, eds. *Reading for Entertainment in Contemporary Russia: Post-Soviet Popular Litera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unich: Verlag Otto Sagner, 2005.
- Levina, Mariia. "Readers of Mass Literature, 1994-2000 — From Paternalism to Individualism?", *Russian Studies in Literature*, vol. 40, no. 1, Winter (2003-4).
- Mesropova, Olga. "The Comedy of Female Sleuths: Televising Dar'ia Dontsova's Ironic Detectives", *The Russian Review*, vol. 65, April (2006).
- _____. "Crime, Byt, and Fairy Tales: Daria Dontsova and Post-Soviet Ironic Detective Fiction", *SEEJ*, vol. 52, 1(2008).
- Morgan, Lyndall. "Darya Dontsova's 'Sleuthettes': A Case of the Regendering of the Post-Soviet Russian Detektiv?", *Australia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vol. 19, Nos. 1-2 (2005).

Nepomnyashchy, Catharine Theimer. “Markets, Murder, and Mayhem: Aleksandra Marinina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Russian Detektiv”, In Adele Barker, ed. *Consuming Russia: Popular Culture, Sex, and Society Since Gorbachev*. Durham: Duke UP, 1999.

Shelton, Joanne. “The Russian Woman’s Guide to Surviving the Post-Soviet Era: From Detective Fiction to *glamurnoe chtenie*”, *eSharp*, Special Issue: Reaction and Reinvention: Changing Tim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008).

三、網路資料

Baer, Brian James. “Translating the transition: the translator-detective in Post-Soviet fiction”, *Linguistica Anteverpiensia: fictionalizing translation and multilingualism*. Bruxelles: University Press Antwerp (2005): 243-254. Available: <http://www.lans-tts.be/img/NS4/Baer.PDF> (2012/10/11)

Boden, Doris. “Russian ‘World-Class’ Literature: Russian Detective Novels Since the 1990s”, *Narumjet*. 46/1, 2009: 51-60. Available: hrak.srce.hr/file/61511 (2013/08/30)

Komarova, Olga. “Crime Does Pay: The Popularity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Detective Stories”, 2003. Available: <http://munin.uit.no/bitstream/handle/10037/640/article.pdf?sequence=1> (2013/08/30)

本文摘譯之東佐娃作品俄文原文取自：<http://book-online.com.ua/author.php?author=9> (2013/08/30)

Донцова, Дарья. Бассейн с крокодилами.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1.

_____. За всеми зайцами.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0.

_____. Записки безумной оптимистки.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5.

_____. Королева без башни.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10.

_____. Крутые наследники.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7.

_____. Любимые забавы папы Карло.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5.

_____ . Маникюр для покойника.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7.

_____ . Урожай ядовитых ягодок.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2.

_____ . Филе из золотого петушка.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2.

_____ . Чёрт из табакерки.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2.